

甌風

OU FENG

第十二集
主編 方韶毅

 上海遠東出版社

甌風

— O U F E N G

第十二集
主編 方韶毅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瓯风. 第十二集 / 方韶毅主编.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76-1228-6

I. ①瓯… II. ①方… III. ①文史资料—温州—文集
IV. ①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863号

瓯风第十二集

方韶毅 主编

策划 / 黄政一 责任编辑 / 徐婧华 封面设计 / 何天健 胡文胜 封面题字 / 苏步青
美术编辑 / 李 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00千字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ISBN 978-7-5476-1228-6/G·781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出品人

王 手

主编

方韶毅

编委

卢礼阳 金丹霞 沈 迦 方绪晓

目 录、

专题	我在文中二十三年	张鹤与	一
	龙川记忆	金城濠	一四
	大甬艇	沈洪保	二一
记忆	画里扶筇诗里去		
	——纪念夏承焘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徐宗帅	二九
	布衣的情怀		
	——我所知道的陈梦熊	卢礼阳	四〇
	自学：我走过的路	潘少华	五七
	犹忆少年读书时	洪水平	八〇
	“国子书店”诞生记	黄泽	八三
	《高机与吴三春》的来龙去脉	沈不沉	八九
文论	“团契”一词的诞生及其意义		
	——再论刘廷芳对中国基督教的贡献	吴昶兴	九七

风土	做把戏	倪蓉棣	一一九
人物	郑振铎先生与《古本戏曲丛刊》	程毅中	一三一
	赵瑞椿艺术之路上的老师们	金丹霞	一三五
	项骧传略	王兴雨	一四八
笔记	刘节进京校史前与中华书局往来函电探秘	洪光华	一五九
	读《存牍辑览》想到的	周履锸	一七六
	陈适发表在上海《立报》的九篇集外文	肖伊绯 辑	一八四
编后	老花效应	编 者	一九八
档案	《瓯风》第一集至十二集封面		封二
	《瓯风》毛边本纪念章		封三

亨利·汤普森：“我们很难看清历史，因为那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当时没有人了解，为了回顾，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张汝伦：“人类最根本的悲剧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但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选择不对的去做。”

一、山城中学

我一九六一年到文中，是在文成第二次建县的时候。文成第一次建县在一九四八年。从一九四一年温州第一次沦陷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文成大岙一带是温州地区的战时后方。那里聚集着希望和力量，日机都来轰炸过。漫长的四年磨难，使大岙得到新生。它的将来无重回草莽的可能了。设在大岙“蟾背山”的瑞中初中分部撤离后，大岙士人在原地办了“民办初中”。他们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中学，取名“栖云中学”。三年后，一九四八年建县，将县治设在大岙，是合理的发展。但是，这次建县却失败了。一九五二年，它被撤消并入瑞安县。一九六一年，文成的第二次建县因而成为大事件。文成人自不待叙说，即使大批到来的“外地人”，虽是奉命，也充满使命感。大岙街上到处可见“外地人”，大学生不再是希罕之物。

我报到的学校就是这所“栖云中学”，当时称“浙江省文成县第一中学”。这样一个大名号，

如此迅速地授予，足见省府的重视。它在“苔湖头”。一九四八年建县时，刚成立的县政府要占用“蟾背山”的校舍，只得搬过来。学校搬来后，校名一再变易。至于“浙江省文成中学”名，据《温州市教育志》记载，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恢复”的。

这地方原是“苔湖娘娘宫”。我到的时候，正殿尚在。它旁邻厨房，作为学生饭厅和集会的地方（一九七二年拆建为礼堂兼室内体育场地）。宫观区的布局依旧。正殿后方称为“红楼”的二层木质寝殿，楼上作教师宿舍，楼下是图书馆。一厢寮房，除留着通向外面“水沟”的通道外，分隔成三个教室，一个做教师餐厅，两间空着。另一厢寮房，翻建为砖瓦平房，三个教室，两个做女生宿舍，一个空着。这里命名为“蓓蕾院”。男生宿舍设在“承文”。“承文”不属宫观，但邻近。早年是由陈氏祠堂改的小学。男生宿舍设在它正屋外面的二层木板房里，通铺。正屋成凹形，做教师宿舍，也住些女生。在“承文”隔一小巷的地方，有一座二楼“孵坊”，住着六位教师。“孵坊”别有业主，因紧邻厨房而被征用。

在上面提到的水沟外面，有教学、教师住宿共用的“东风楼”，是一座二层水泥楼房。对面有砖瓦平房“跃进馆”。两房可用为教室的共十四间。学校只设仪器室，未设实验室和教师办公室。“大跃进”时建的，头两届高中生曾为它进山背木材。这里是教学区，原初约是娘娘宫的园地。在它们的北侧有小操场。操场内端左右开了门以供农户交通，可见这地原是农田。早些时候，在娘娘宫中轴线上、正殿前方，曾建了一幢二层“三好楼”，现为办公楼。站在“三好楼”二楼，可与“红楼”隔空相望。两极之间，即娘娘宫主建筑之所在。

这些是校园之全部所有了，总共面积二十五亩。学校在一九五八年增办高中。我到的那年，有高中四个班，初中五个班，二百八十九名学生，是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进校的。学生数少，是因为高中学生农村户口不再迁为城镇户口而

骤减的缘故。

学校校园距“第一中学”的要求甚远。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十几年过去了，学校还这模样，令人唏嘘。不过，也不能责怪什么，因为县城建设也停滞不前。文成建县的一九四八年初，在县府前面的民居区曾开拆出一条“县前街”，至一九六一年还只建成一半，即从县府到“大岙街”交叉路口一段，商业街的样子。另一半，即从交叉口路通向泗溪的一段，还才是条“路”，路边住些人家，一无“街市”的气息。成市的街仍是那条年代久远的大岙街。我见过这条街，窄的地方，屋檐水直倾街心，店铺与民居间杂，路人可与毫无遮掩、备着枝条供人去污的“滓坑”不期而遇。古貌依稀。

二、荒唐岁月

一九六一年，我们同时到文中的共七人（杭大五人，浙大二人）。早我们一年，瑞安向学校派遣高中主课教师六人。稍后，来了刘曼珊，任副校长。她是从北京女师大毕业，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曾任北京女八中副书记、副校长（正书记、校长是上将王震的夫人王季青），北京市“模范教师”，在北京教育局人事室股长任上主动离京随夫南下。她丈夫是国务院外调干部，到文成任副县长。文成人把这看成希罕事。一九六二年秋，温化一些项目准备下马，向文成下调一批干部，其中一人分配到文中，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参加过三机部一个保密研究所学习（与研究原子弹有关）。六二年秋季开学时，我爱人在没有正式告知的情况下从上海被调到文成。去办手续的时候，他们校长却不知情。一个只有九个班级的学校，来了那么多人，十分惹眼。

这批人来文成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有正面对抗困难的思想准备。那个时代讲奋斗，讲奉献，弥漫着“一穷二白可以画



刘曼珊（左三）与张鹤与（左一）、何烈华（左二）、季荣耀（右一）
合影于一九七七年



文成中学老校园

最新最美图画”的豪气。世事的“意义”，往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学校内外不吝溢美之辞。

一九六二年冬初，文中突然端出一个“反党小集团”，说是攻击党支部。批判会上点名两个人，一个被指为“头头”，就是那个北大毕业生。另一个被指为“干将”，是一九六〇年分配到校的。这件事非我所能理解，大感意外。因为在我们毕业前，毛主席对大学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的做法，已有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的指示，学校也为受冲击的学生作了改正。“小集团”的提法更是多年少有听闻了。文中“小集团”这事本身，在逻辑上也是难成立的。北大毕业的那人到校才几个月，木讷，不善与人交往，怎么一下就成了“头头”？他该有“右派”嫌疑，但温化曾派人到县做过澄清。那个“干将”，一向开朗，出身数学世家，喜欢唱歌，是大家知道的。何况会上也没指明“小集团”有些什么人，有什么具体活动。

我当时任教高三、高二两班语文课，忙得很，只在晚饭后与九月才来学校且因住房不便赶在农忙假里新婚的妻子去泗溪堤上散散步，不知就里，会上没有发言。教工团支部书记“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要我“表表态”，毕竟其他教师都表态了。我答应了，为说明诬蔑者“无中生有”的意思，笼统地提到风闻的所谓“不当关系”问题。会后中饭时，团支部书记到我房里责怪说，领导气得中饭也没吃，你最好在下午的会上消消毒。我大惊失色，不明白这四个字怎么是犯讳的。

批判结束后，“头头”被发放到林场放牛，“骨干”被贬到区小学教书，此外倒不见其他大的动作。我戏引赫尔岑“历史的即兴表演”一语，把这事归为偶然的“事件”。此后，学校虽然时时露出诡谲气氛，但工作还算“照常”。一九六三年，学校把开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做得有声有色。刘曼珊站在第一线，教师自作

学雷锋的歌曲，自编学雷锋的话剧，师生同台演出。这事像是告结了。

在“文革”期间，这件事的背景慢慢明晰起来。原来，在县里任副县长的刘曼珊的丈夫与县领导发生矛盾。县委领导要把矛头指向刘曼珊，借此向她丈夫施压。那时文中，又恰逢学校领导的“不当关系”问题在县机关遭热议，他正企图把这归咎于刘曼珊。一九六一年前后来校的教师，许多“成分”不好，刘曼珊却看重这些人的专业水平与干劲；北大毕业的那位“右派”嫌疑，刘曼珊却拉他去听老教师的课，都被认定为“右倾”的表现。据揭发的人说，当时领导班子内已经与刘曼珊的“右倾错误”作了斗争，刘曼珊就是坚持错误。批判“反党小集团”是为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不摆具体事实是为不想把这些事公开在教师面前。这自然是一套说辞。其实是要制造一个“事实”向县里报告，同时撇清自己的问题。大家获知，那位领导的“不当关系”是实有其事的。

在一九六二年那个年代，给人戴上“右倾”的帽子真有可利用的背景的。二〇一二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第二卷第十三章就以“对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标题叙述其事。如一九六二年“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北戴河会议就断言“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那些，是我在近年读了这类书以后才得到的“知识”。就当事者说，他当知道“群众”与“党内”的界限。而且，八届十中全会已指出，“工作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要分开”。这个文件是传达到十七级的。他们自然知道这些政策。但仍如此借势整治群众以售其奸这样的事，却敢做，而且堂而皇之地把它做成，十分狂妄，摆明权力的跋扈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说的话。

刘曼珊是知道就里的，又领教了那种手段，也居然在一九六四年夏，即在一九六三年《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公布一年后，公布多件条例，什么课堂管理之类，共一〇一条。文中可是一

向没有明文规则的。这些条例，虽极基本，却有另搞一套的嫌疑。这么一个“一〇一条”，在“文革”时，果然作了“管卡压”的罪证，用来“揭开盖子”。她再次做了尴尬人。

学校那位领导一九六六年五月调县委工作，新来一个不久前从部队转业的副书记。六月，“文革”开始了。“工作组”进校领导，任组长的是县委副组织部长。新来的副书记遵命奉行。他们在揭批“一〇一条”不久立马把矛头指向刘曼珊和“小集团”。一九六二年时，“小集团”是个影子，此时则一一点名，把一九六一年前后来校的外地青年教师全包括了，被调出的也“揪”了回来，统统被“隔离”在一个二十个人合成的“学习班”（“牛棚”）中。他们召开全县教师大会，由县委发文把那北大毕业的再定为“右派”以“造势”。因为做得实在离谱，一位一九六四年毕业、从“四清”回校的教师，因为结识县委一位干部，向他提出质疑，于是又宣布取消。

“牛棚”中，大部分是青年教师，三十岁上下，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说班主任也是当权派）”。有“三青团”之类污点的几个老教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一切程式都从北京移植过来。这是“背景设置”。有此背景，刘曼珊就坐实成为后台了。这是他们在六二年想公开做而没能做的事。大会小会轮番批斗她，联系她丈夫（他原在北京做地下工作），要她签字。她坚拒，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签字运动，摁倒在地也不跪：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宁死不屈的架势。于是被戴上“对抗革命”的帽子，反复拉出去游街，挂木牌示众。她丈夫在县里受批斗、体罚致死后，对她的斗争因而加剧。文中“文革”的特点是承继六二年的风波的。

一九六九年初中招生，一九七一年恢复高中招生（均二年制的）。六九年招生的时候，“牛棚”里的教师被“下伸”到刚办的公社初中教书。我则因县革委会成立大会上被革委会主任亲指为“篡改革委会主任报告”，因而是“现行反革命”，被隔离。半年光景后，

我被下放农村劳动。那地在半山腰，主要是种番薯。我去的时候，番薯丝早早晒好了，没农活可做，却结识了不少“小年青”，观摩过农村迎亲、拜堂、闹房的习俗。终身难忘的经历是“代课”教了一个月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数学，“天安门”三个字，要上两节课，真是很难教的。一九七二年，突然叫我去黄坛中学教高中毕业班语文并当班主任。

把“牛棚”中人下伸公社，在文中，是为“清场”。只是非学习班的教师，有调往县里工作的，有调回家乡的，有出国的，走了不少，大出谋事者的意料。虽然进了六六届至六九届（老三届）大学毕业生，还是弄得一九七〇年秋初中招生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由“县小”附设四个初中班，一学期后交还文中，请四位县小教师跟班过来上课。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一九七一年五月，县委给文中任命了正书记、革委会主任。一直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原位不动，这也是意料之外的吧。一九七〇年进初中的这些学生在一九七二年夏毕业，高中仍无法按时招生，等到一九七三年三月才收了四个班。这在温州地区是仅有的现象，更是意料之外的。

林彪事件后，一九七三年二月，新县委成立。新任县委书记兼文中书记、校长，刘曼珊恢复为副校长，让一九六九年“下伸”的教师悉数回校任高中课。我也同时回来。上述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四个班正是此时招进的。“批林批孔”来了，发展至一九七四年反“复辟”时，县委被改组，文中自然也改组。前一任书记、主任重回文中主持“批林批孔”，刘曼珊再次下台，副书记也下台。我们再在文中听听胡言乱语。这是真的，那个讲“法家”的人，连辞句都没解释通。

三、不典的结局

“四人帮”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文中领导机构作调整，

刘曼珊任副书记、校长。那位副书记复职并升书记。但他另有所系，奔走于借调，不大在校。这年学校恢复“文成中学”校名。刘曼珊不想回北京与子女团聚，说要为文中做点事。此时，她已六十八岁，找我与教数学的季老师做副手。我们百般拒绝，她却不依不饶。我们最后同意挂教导处副主任名协理一阵。不久，又来了一位部队复员干部任副校长，分管总务。

当时，一九七三年稳定下来的秩序已遭“批林批孔”运动颠覆，连正常的上课制度都没有了。一九七七年十月，说要恢复高考，许多学生要求回校复习。他们小学学的是“语录”，初中学的是“大批判、小评论”“三机、一泵”“三酸、二硷”，高中又在“批林批孔”中度过的，怎么去高考？于是办“复习班”。一九七七年高考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举行。这年高考，文中应届生二人上体育本科，往届生七人上本科（区中学共四人上本科），在温州地区排名靠后。县府决定把全县的历届高中毕业生集中到文中开办“复习班”。县委径自下文任我们两人为副校长。我唯浩叹而已。一九六一年进文中时的情怀犹在心头，但是我没有做行政工作的意愿，只是学生的努力和期待让人寝食难安。

刘曼珊夜以继日工作，校园之内，无处没有她的身影。大家很感动。刘曼珊也明白，光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有一支队伍，要有一定的组织和秩序。县里接受了。县教委按文中的指名从各区中学抽调教师。开始，几人还是来兼课的，三天在原校，三天在文中，至一九七八年末，抽调了十多人。“复习班”按志愿分“大专”“高中专”两类建班，不收学费，住宿自理。教师不取加班费。在校时间统一管理。县委的支持是很有力的，他们甚至同意农村户口的高考班学生可“番薯丝换大米”。

当时文中，高、初中（两年制）共十六个班，加上复习班，共二十个班。全校六种不同程度，多数教材需自编或需变通，负担极



文成中学校园新貌

重。我们两个副校长兼教师一样的课，教学行政只得交教导处“司令”：安排课表、印发“工作简报”。所谓教导处，无非副主任一人，讲义刻印一人。学校抓正规化却是认真的。在高中选择适合初中教学的骨干教师到初中带班。全校从升旗仪式做起，建立各类规制。一九八二年，学校女排还代表温州地区参加省中学生女排联赛。

一九七九年高考大学考上了四十九人（其中应届生十三人，一人为省“状元”，四人上浙大；往届生上了三十六人，一人上浙大；全国升学率百分之六点一）。当时的教委主任赵云图在后来的《文中校庆纪念册》撰文说：“文中被大学录取四十九人，占温州地区总录取四百五十六名的百分之十一。占温州地区人口十八分之一的文成考上大学的却占九分之一。”《浙江日报》以“山窝里飞出金凤凰”为题发表述评。兄弟学校来考察、听课的络绎不绝。一九八〇年，在文中召开“温州地区中学工作会议”，地委宣传部长胡万里、地区教委主任杨玉山亲临主持。一九八一年把文中列为浙江省八十所重点中学之一。这是文中办学以来第一次得到“重点中学”名号。

当时高考热，领导机关抓得很紧。文中基础薄弱，很难跟得上，再说教育要讲基础，讲连贯性，无法急于求成。文中因此无突进的想法和做法。有利条件是当时高考难度不高，只要方法得当，速补仍有余地。因此我们提出“有效率的、稳定求进”的方针，要求教师“研究高考试题，把握知识结构，设计有效练习”，把课讲好、使练习有效。“工作会议”的评价是“学校正规，师生勤奋，竞争意识强”（赵运图文）。这是反思前事的话。当初，大家只是期待，依托的是工作系统性和对教师的信任。一九七九年高考有此成绩是出乎意料的。

当时文中，可宝贵的是一支水平相对高的教师队伍：一位教师参加了省七八届高考语文（高中专类高考由省命题）命题（三人组）。